

中国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关键词

潘 雯

【提 要】从文艺批评与理论研究者的视角出发，以文本与现实参照的方式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的现实意义与行动指向，可发现“中国精神”是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关键词。而文艺理论批评所阐释与呈现的“中国精神”，是将概念化的“中国精神”推至民族审美的文艺研究范畴，是“中国精神”意义的深化。“中国精神”落实于文艺批评，是强调批评精神的当下性；落实于文艺理论，是强调理论架构的深刻性。只有当下的问题意识与深刻的理论背景相结合，文艺研究工作才能实现“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关键词】中国精神 当下性 深刻性

【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6) 04—0069—07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一年后的2015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全文对社会公开。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讲话》和《意见》广泛掀起文化战线与社会各界探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热潮。笔者从文艺批评与理论研究者的视角出发，结合时代背景体会《讲话》与《意见》的当下意义，分析其中所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路径——“中国精神”，对于文艺批评和理论来讲应有哪些深义与指向，并且结合实际提出“中国精神”落实于批评与理论实践的可能方式。

一、核心价值与文化自信：当前 国家重视文艺建设工作的 时代背景

近一两年来，党和政府对国家文化建设与文艺工作的重视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的。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开篇明义地指出：“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今天，当我们进一步深入体会《讲话》和《意见》的真髓，正面思考当下国家文化建设给出的种种课题时，我们首先要理清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序中谈论文艺，是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探讨文艺创作、文化建设和民族精神的问题。

国内的背景是迫切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尤其是培育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的工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方面国内的文化氛围越来越宽松多彩，文艺活动从精英文化主导的单一型格局渐渐转向多元实践与多种话语共存的立体型格局。另一方面大众消费主义文化也带来了社会审美趣味的低俗化与文艺创作的快餐化、机械化的问题。习总书记的《讲话》毫不讳言地指出当前的思想和文化危机：“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① 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加强，如果国家的顶层设计者只重视物质生产、却任由思想和文化危机蔓延，那么我们的民族能否持续而安全地继续发展则存在疑问。文艺创作作为时代思想与文化的最集中体现，对现实中的思想和文化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形塑作用。因此，习总书记的《讲话》针对文艺建设而发声，是有着具体而强烈的现实指向的纲领性文献。

国际的大背景则是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与渗透问题。虽然外国文化的人侵问题在《讲话》和《意见》中并没有被明确强调与指示，但对它的考量却是我们今天进行内生性文化重建不可不知、不可不的一个维度。历史地看，近代以来线性进化论的思想对第三世界民族自信和对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传播地位的影响都是无可否认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力量在二战结束后，配合着经济帝国主义而推行的新的统治战略与方式。它以隐秘而安全的手段进行思想和文化的渗透，去征服和控制其他国家人民的头脑，直接作用于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权力关系的配置。文化帝国主义必然通向文化霸权主义，正如郑科

扬一再指出的：“在当代，文化霸权主义已成为国际霸权主义的一种新形态……是霸权主义国家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新战略。”“因此，任何独立自主的国家，都必须有能力有办法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受冲击，有效防范文化霸权主义对本国文化的渗透和破坏，不断增强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识别力、抵制力。”^② 近年来，学界和社会也在不断反省一些西方思潮对我国文化建设的错误影响，比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面对文化霸权主义，中国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自信于自己民族的传统、价值与创造能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内与国际时代背景，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最为核心的呼唤是两点：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二是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第一点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文艺“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下的继承、重申与发扬。《讲话》特别强调文艺创作和人民群众之间互为需要、互相成就的关系，因为“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③ 人民文艺论是中国新时期指导性的文艺理论——强调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人民需要文艺，文艺也需要人民；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等等。因此，《讲话》和《意见》都热忱呼吁文艺创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同时，也明确指出要从制度改进入手，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① 参见《讲话》中第四个问题“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② 郑科扬：《文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战略的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16年1月15日。

③ 参见《讲话》中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益和社会效益放在对艺术作品的首要评价标准上。如果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党长期的、明确的文艺发展口号，“中国精神”的提出则是着眼当前的新形势而推出的文艺工作的核心理念。

二、中国精神：《讲话》与《意见》观照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

当“中国梦”的概念在2013年被创造性地提出，并成为引领社会的核心观念时，“中国精神”也作为一个凝心聚力地呼唤被提出，意在呼唤当今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①“中国精神”的首要内涵，可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两个维度来界定和阐发。而“中国精神”体现在文艺创作、批评和理论里，还需要被持续深化为能引领大众认知的、能迎接后全球化时代的思想挑战的文艺研究范畴，而不只是规约性的概念。文艺研究者，以及其他工作在社会思想前沿的人文科学的工作者，对“中国精神”的理解和呈现，不仅是基于当下的价值论，更是出自于主体的建构性，即他们需要从“中国”的主体意识出发，以历史的、包容的、生动的、思辨的方式与语言建立起大众对“中国”的深层精神认同和情感结构。这里的“中国”笼统说来包括三层指向：既指向深陷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治理的话语中的，作为“现代国家概念”的中国；也指向那个作为世界文明与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传统的“文化的”中国；更指向今天生动存在着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的“人的”中国。文艺，尤其文学，强调的是那种“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的精神，^②需要塑造有效的主体认同与情感结构。

正是出于对文艺理想与文艺功能的笃信，我们用“文艺的灵魂”来弘扬和践行“中国精神”。习近平在《讲话》里从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出发，过渡到文艺作为一种领先的文化形态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文艺彰显“中国精神”的必要性。他首先指出文化繁荣与民族昌盛之间的关系：“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接着，他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③文艺是最为领先的文化形态，是社会精神风貌最具代表性的表征。因此，文艺发展力量的缺乏与衰竭，不仅是对文艺自身的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的伤害。

《讲话》对“中国精神”的唤醒具有不容置疑的时代意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可以自豪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也可以基于我们的经济成就，系统地发展出阐释中国道路的优势与特色的、政治性的“中国话语”。但是我们的文化事业并没有交出同样非凡的答卷，我们的文艺创作并没有在改革开放以来东西方文化加速交汇的有利语境里壮大、辉煌起来。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标志，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和民族生命力的关键因素。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广泛展开了对于文化品质缺失问题的反思，认为所谓“小时代”的浮躁心理与功利的哲学正在消解经典作品的精神，并产生一系列文艺精气神

①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② 参见《讲话》中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③ 参见《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不足的表现：如文艺创作只服务于感官快乐和只迎合市场的“去思想化”、隐藏立场与逃避责任的“去价值化”、否定历史大义的“去历史化”、自欺欺人的“去中国化”、以“多元”为名却恰恰舍弃了“多元”批评精神的“小我”的“去主流化”等等。^① 扭转文艺风貌的关键是要打造出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思想助推力，“中国精神”正是针对当代文艺流弊而开出的药方。

三、批评的当下性：文艺批评阐释“中国精神”的必由路径

“中国精神”如何落实到文艺创作上，目前已经探讨得很多了。但文艺评论如何与“中国精神”相结合，这方面的对话才展开不久。我们说培养更健康的民族精神，涵养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其核心是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传统文艺批评有两方面的功能：“对外保护文艺，为诗辩护，鼓吹艺术地位的提升；对内教导诗人和艺术家，告诉他们该怎么做。”^②

从客观条件上看，今天中国的文艺批评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从业人员规模，都已超越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但是，到底我们的文艺批评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到底文艺批评的从业者们能不能够敏感而准确地把文学所蕴含的时代与民族精神挖掘出来？对此批评界内部一直都有检省的声音。但深入而广泛的、针对批评的批评，还是与《讲话》和《意见》的引领作用密切相关的。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批评存在的问题的总结可谓切中肯綮：“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

健康发展。”^③ 站在构建“中国精神”的角度，过去一年多来，学界对文艺批评的探讨主要存在这三方面问题：用西方理论来裁剪中国人的审美、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

这三种文艺批评问题的出现与我国主要批评力量的构成有关。以数量可观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和教师构成的学院批评是目前文艺批评的主要力量。这种学院批评风格背后有着种种复杂而顽固的原因，如科研制度设计的影响、崇古薄今的文化心理的沉积、实际能力的不逮。而通过理论来说话可以掩饰自身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不足及批评者责任与勇气的缺乏。^④ 学院批评对现实的回避客观上把大众话语空间让渡给了商业化的批评，致使商业利益成为批评的驱动力。而国家大量投入财力而培育起来的学院，其批评的“社会产能”极低。这种批评形态上的不均衡发展状况势必造成文艺批评公信力的下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为推进批评的有效性，学术评价机制已经出现了显著的调整，鼓励批评走出之前的误区。

重要的是，从去年对文艺批评工作的三方面反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对文艺批评的反思与对文艺创作的反思是沿着同样的向度伸发出去的：和创作一样，我们的批评也存在着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的问题，存在着价值褒贬和甄别功能弱化的问题。换言之，当前文艺批评者对文艺创作者提出种种的批评、指导与建议，完全可以向内转为对其自身工作的反思和对自身问题的批评与建议。因此，具体

① 董学文：《挣脱阻碍文艺健康发展的思想桎梏》，《求是》2015年第16期。

② 高建平：《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③ 参见《讲话》中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④ 关于对产生文艺批评问题的原因的分析，本文受以下文章的启发。郜元宝：《批评五嗟》，《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张江等：《当下的批评是不是学问》，《人民日报》2014年8月15日。李艳丰：《文学批评要站好自己的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8日。

到文艺批评该如何抵达“中国精神”，和创作一样，它也必须把作用于现实的当下意义——即“当下性”作为抵达的路径。培养“当下性”首先必须纠正批评的“非当下化”问题。文艺批评的“非当下化”是指，文艺批评或以回避现实矛盾的态度站在中国当下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之外说话，或因只承接国外理论和话语的影响而做出“食洋不化”的现实批评。文艺创作介入中国当下、思考中国问题，文艺批评也应当如此。综合目前国内学界众家之言，培养文艺批评的“当下性”，可以从以下路径着手：制造对话、拥抱生活。

首先，当下性需要批评者真正怀有中国的文化立场和身份，善于分析、阐释文学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从中发现能够吸引学界响应或大众探讨兴趣的公共话题与社会思潮，通过有效对话去作用于社会意识的建构。张永禄和王杰曾撰文强调文艺批评对公共话语的引领作用，指出“文艺批评家并不要求一定将艺术经验和艺术参与的社会预见用理论的方式系统表现出来，但是，文艺批评‘但开风气不唯先’的轻骑兵功能与思想引导责任……意义同样重大，其价值并不亚于艺术创作。”^①从话语哲学的角度说，话语的力量来自它们是使用中的语言，流通中的对话。制造议题比如何谈论一个议题更重要。一个议题制造出来，不管它获得的反馈是赞同还是批判，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都已经是被认知和思考的对象了。文艺批评首先要发挥的作用是打破言说困难与沉默。

其次，当下性的批评应该是有温度的、拥抱时代和生活的批评，而不是以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方法使用文艺理论，进行先验的、理论预设下的批评操演。批评要求文学创作反映人心、人性和人情，那它自身也同样不能远离生活、逃避时代，不能回到学术的形式自洽和内心的安全中去。周扬曾经要求作家和批评家去冲破“无冲突论”对文学意义的阻碍：“生活中总是有前进的、新生的东西和落后的、垂死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家应当深刻地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清楚地看出现实发展的主导倾向，因而坚决地去拥护新的东西，而反对旧的东

西。”“任何企图掩盖、粉饰和冲淡生活中的矛盾的倾向，都是违背现实的真实，减低文学的思想战斗力，削弱文学的积极作用的。”^②面对今天文艺批评力量的衰弱，甚至有学者认为：“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③当然，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有温度的当下性批评，不是把情怀或政治态度作为批评的全部内容或第一标准。我们一定要明确，唯有真才实学是学术不可撼动的第一标准。

四、理论的深刻性：文艺理论抵达“中国精神”的必由路径

文艺批评做到褒优贬劣、激浊扬清，需要文艺理论的支撑。毕竟，批评是离不开理论的指引的。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作为文学见解积累的结果，既是一些批评的结果，也是另一些批评的先导。《讲话》和《意见》都彰显了党正确处理文化资源的方式。《讲话》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④《意见》也同样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展现中国当代审美风范。

有学者总结，在2015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界的主要思想进程大致有四点：一是针对西方文论的根源进行本土性反思；二是呼吁回归

① 张永禄、王杰：《文艺批评是公共话语的引领者》，《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②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③ 蔡焜、熊元义：《文艺批评与学术创新》，《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2期。
④ 参见《讲话》中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是培养出由民族向世界的视野高度；四是找回“文学”本身，建构文学学科自身的精神深度。^① 这四点显然是对《讲话》所明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的呼应之举。对文艺理论的中国话语的呼唤绝不是今天才浮出水面——从2000年左右对“失语症”的探讨开始，中国文论界早已对国外文学理论以平面化、不分时空序列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进行揭示与批判。但是《讲话》和《意见》中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表述无疑将构成决定性的转折点：在强调重塑民族经验的中国性的同时，文艺理论的深刻性也是它抵达“中国精神”的必由之路。因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有深度上的要求。理论和批评不同，如果说批评的主要功效在于它能轻快地掀起发现的一角，理论则往往依据历史的沉淀来做统摄性的命题创造和系统性的思想架构。而深刻性是理论建设必须追求的品质。这里不妨结合一些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建设的实例来体会“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落实于当今中国文化理论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历史的”首先关涉中国古代文论，以及中国哲学思想的现代性转化问题。通观古代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古典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两个专业领域都已有不少成果积累。新时期以来，国内的“龙学”研究——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拓展。根据陈士部教授对当代“龙学”研究的述评，当今的“龙学”已不是在“单质的文化语境中恪守校录辑注考据等传统学术旧路”，而是以“回归原初语境”与“现代学术方法”和“中西跨文化比较”之间互现互补的方式，将《文心雕龙》放入更深度的思想对话中：书中的风与骨、文与质、情与采、意与辞、奇与正和繁与约等概念被纳入当代的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中；书中的诗性审美和思维方式具有和西方文艺审美精神对话的本钱；刘勰的综合“言志”与“缘情”的主体意识和他的“乘一总万”、“唯务折衷”的方法论等，都有深远的阐释空间和丰富的现代价值。^② 因此，在转化古代思想资

源的过程中，深刻性既意味着对原初意义的还原也意味着对现实意义的引申，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化品质。再看以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为基本特质的比较文学研究，这一领域也提供了古今中外深刻对话的可行路径。比较文学领域里贯通中西方诗学与哲学的研究不胜枚举，尤其是海外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成果，如高友工的《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抒情境界》、孙康宜的《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等。他们在不同语际间整合理论与话语的能力——比如把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文学的阅读中去，以及他们所实现的跨文化对话的深度，应该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更大规模的、系统化的中国学术与文化建设的借鉴。

“人民的”这一方向，指向对承接地气的、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审美资源的寻找。用作家张抗抗的比喻，无论是作家和艺术家，还是批评家和理论家，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就是“‘人民’这个群体中的一滴水、一粒米、一片叶子”，经历着人民的所见所闻，体验着人民的所痛所喜。因此，如果一个作家“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诉求，在创作中自始至终坚持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理想，而不是出于个人物质利益……以趋利避害之心去选择写什么怎么写……那么，这应该是一个有人民性、有良心的作家。”^③ 理论家也应具有这样的人民立场和批判意识，否则怎么能体会并升华文艺作品中的博大情怀？在这一方向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是其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两脉的重建与统一。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出发，我们系统地发展出将文学作为社会精神现象和意识形态来看待的理论，从而赋予文学作品更深刻的意义和更科学的说明，指引大众

① 冯庆：《“中国时势”：文艺理论研究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16年1月4日。

② 陈士部：《新时期国内“龙学”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③ 张江等：《文艺家何以先觉、先行、先倡》，《人民日报》2015年5月1日。

思考文学所反映的社会权力问题，进而推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本文所思考的“中国精神”，是上升至民族审美的文艺理论范畴的“中国精神”。“艺术的”和“美学的”阐释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不可或缺的内核与学科本质。如何发现这个时代和民族的经典，需要批评家和理论家博大精深的品读能力。而且，在信息化高度发展、大众阅读已成为唾手可得之事的数字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如何以创新的角度和冲击性的力度去引领时代之先声；不但能够辨识和揭示艺术作品的内涵，还能够发现以文学和艺术方式精心包裹出的“无名之实”，这些挑战变得日益困难。为了迎接挑战，理论家除了需要具备时代意识外，还必须扎根中外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把握时空变迁中的现象与规律，以形成具有“中国精神”的美学风格，探索民族文化的优势与独特性所在。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不仅对文化事业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意义，同时

也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时代宣告的意义。至此，“中国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渐渐被赋形于大众文化语境。它进入书本、网络和街谈，凝聚起社会话语的力量。围绕它的语言是多样纷呈、和谐与抵牾并存的。但是，对于它作为话语起点的提出，我们的认识必须统一，那就是“中国精神”体现了进入21世纪新时期后国家对于其文化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对于其文明传承使命的坚守。它的提出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复杂深刻的变革和转型，优秀的批评家会饱受思想的困惑、心灵的煎熬与精神的撞击。但也唯有如此，批评家们才可能贴近世道人心、洞穿时代迷雾，生产出智慧的思想，并有效地参与到时代精神的建构中去。

本文作者：文学博士，浙江省委党校外语
教研部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左杨

The Spirit of China: A Key Word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n We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parallel study between two important documents issued last year in China—One is Xi Jinping’s “Speech on the National Forum of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the other is “Proposal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s”—and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Spirit of China” is now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t requires critics to make criticism of here and now, and do some deepening work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can reach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only by explaining literature and life with views from history, views for the people, and views of artistic and aesthetic quality.

Keywords: the Spirit of China; criticism of here and now;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profundity